

· 纪念福建事变六十周年 ·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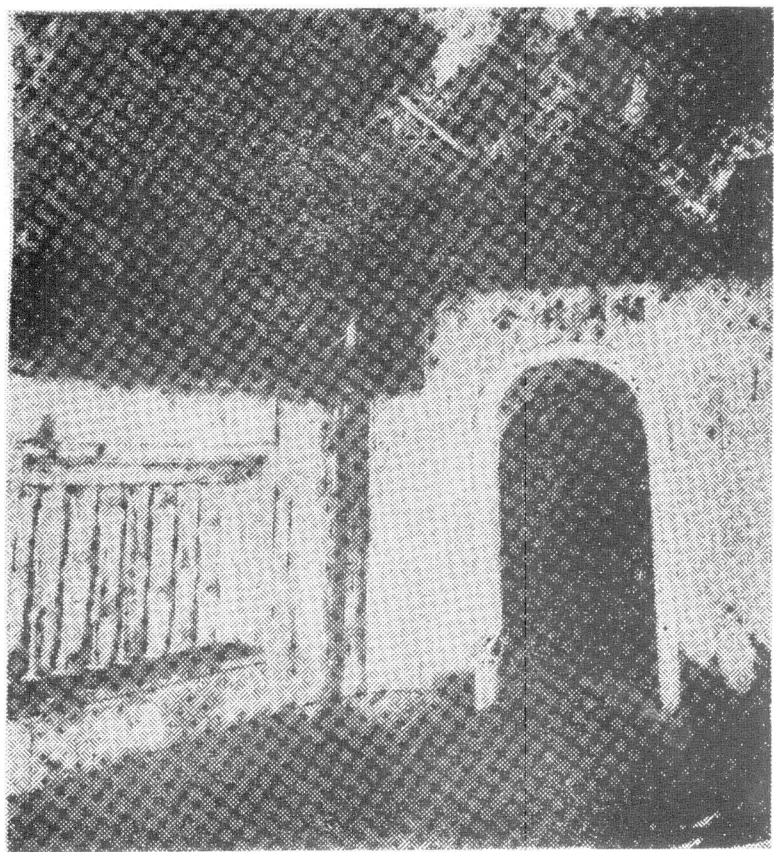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

· 纪念福建事变六十周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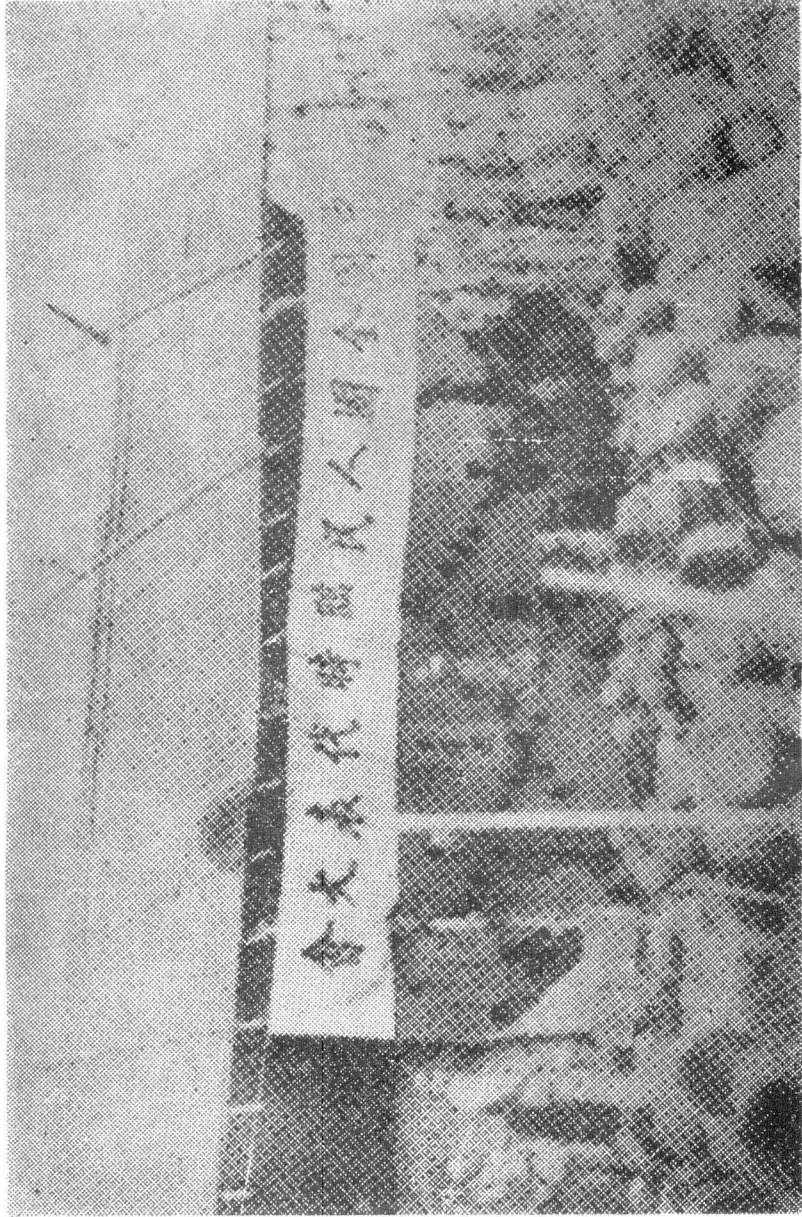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



福建事变秘密会议地点福州于山戚公祠补山精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會場照片

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十九路軍

訂立的抗日討蔣協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上蘇維埃政府與十九路軍雙方為挽救中國民族之生命以對帝國主義殖民化中國之險惡，並實行維護政府及其不棄大憲法，並繼續進行抗日救國的軍事同盟，因此，定此協定，條件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停止軍事聯盟一切條件之執行，不得對其主力部隊進行圍剿，同時十九路軍亦不得用各種方式破壞或消滅在蘇維埃政府與十九路軍協定之一切抗戰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之舉。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停止其鎮壓各干區中政治同盟。

四、蘇維埃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共同維護國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並統一各民衆抗日反帝同盟及革命武裝，一切武裝組織，均充公出敵討蔣，同時集會應一律自由。

五、在初步協定簽訂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應即撤去協定前所發之所有命令，並停止進行抗日救國軍事行動之準備。

六、初步協定簽訂後，雙方全體代表互相簽字蓋印，雙方保證安全之酒。

七、雙方人員有必出往來時，由各代表人互由雙方負責保護該代表等人員之一切安全。

八、本協定在福建及十九路軍方面抗日反軍事同盟未達成前，雙方對各區反帝性團體守秘密，協定公佈後得雙方之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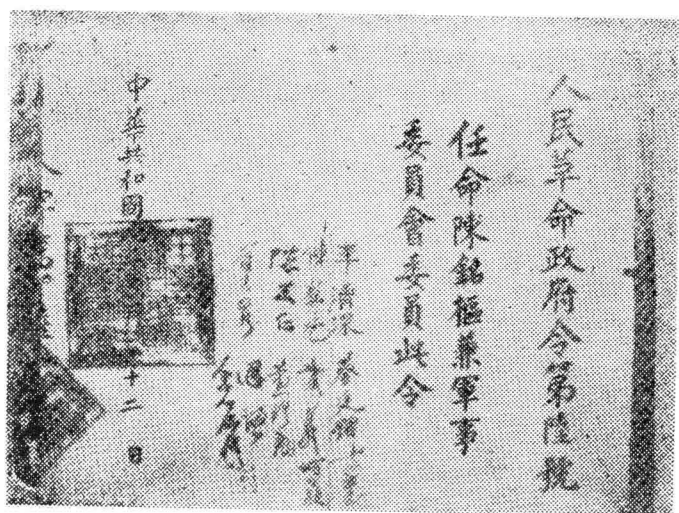
九、協定成立後，雙方應完全切實履行，並反互保護其別項協定。

十、雙方宜共同保護彼此有惠之反蔣勢力，並互保。

十一、本協定在雙方全權代表簽訂後，即行生效，並正式簽字，並得雙方政府正式承認，正式簽字人姓名均登載各報，一併刊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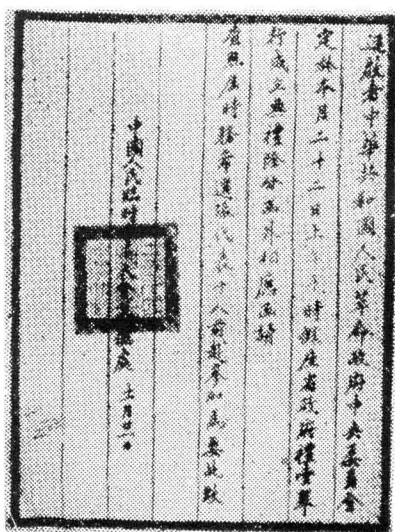
公曆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十九路軍訂立的抗日討蔣協定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第陸號任命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筹备处通知



序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春秋。

60年前，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我党抗日救亡方针的影响下，响应我党团结抗日的号召，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一部份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发动事变，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裂，实行联共、反蒋抗日，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互派了代表，协调开展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

在事变前后，我党与十九路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曾有过不少交往，但由于当时我党处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对待事变所采取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致使双方的交往、联系，未能继续发展下去。

由于当时力量对比的悬殊，加上其它方面的原因，尽管事变在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56天之后，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但是，它仍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的反蒋抗日、团结救亡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仅实现了先驱者的遗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今天我们编写《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这本小册子，来纪

念福建事变60周年，目的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迪后人，努力巩固、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争取台湾早日回归，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这本小册子由三个部份组成。事变综述由仓山区人民政府薛崇耀同志撰写，大事记由市委党校林真同志撰写，人物简介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严传全、宋建新同志撰写。由于编写时间匆促，史料不全，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予以指正。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3.9.15.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综述.....	(1)
大事记.....	(24)
主要人物简介（以姓氏笔划为序）.....	(58)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十九路军，面对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推动下，从国民党营垒中分裂出来，联合李济深、第三党等一部分抗日反蒋势力，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他们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相抗衡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向着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事变策划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合作关系。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与决议，对十九路军等中间势力继续采取排斥、打击的关门主义策略，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又由于事变策划者在政治上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军事上进行错误的战略部署，致使事变在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军队猛烈进攻下迅速失败。福建事变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加速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进程。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

早在十九路军入闽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其就有过某种形式的联系，并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十九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之一部，北伐战争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他们遵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影响和配合下，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他们扩编为第十一军。当时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第十师中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其第三十团团团长范孟声和全团官兵都是共产党员，廿八团、廿九团亦有不少共产党员，（2）如徐石麟、朱恶紫、于以振等。

大革命失败后，第十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曾一度加入“八·一”南昌起义军的行列，师长蔡廷锴任起义军参谋团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和左翼总指挥等职务。在起义军南下时，该师离开革命队伍，于八月四日在江西省进贤县城关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从此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成为新军阀混战的工具。

1930年8月中原大战期间，第十一军的第六十、六十一师改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一至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时，一些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潜入该部队，如郑乃之（原名郑雄冠）、郭隐瑜（后改名刘突军）等。他们互相联系，开展零星活动，曾“在江西几次兵变计划不成。”（3）

“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阐述了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在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各地学生开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日宣战；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直接或间接地向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国民党营垒中的抗日反蒋情绪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酝酿着“宁都起义”。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在接到日寇侵占沈阳的电讯后极为愤慨，翌晨即集合本部宣布来电，“各官兵无不愤激动容”。（4）

9月25日，红军领袖们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书》，号召国民党军队团结起来，掉转枪头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也在驻地和行军路上张贴、刷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不对内”、“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5）在中国共产党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十九路军三万余名官兵曾在赣州体育场的阅兵式上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6）

1931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国民党广东派孙科、陈铭枢等也曾声言与共产党、红军妥协。作为“宁粤合作”条件之一，十九路军被调成京沪一线。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处处“寻衅”“商店被滋扰，人民被侮辱，并派兵舰飞机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十分愤慨。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议共同誓死保卫上海，（7）积极准备抵抗，尽“守土之责”。（8）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武装进攻上海，十九路军爱国官兵无视蒋介石的不抵抗禁令，奋起抗战。他们在上海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坚持抗战三十三天，给日军以重创，迫使侵略者三易主帅。

淞沪抗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举国振奋。中国共产党派了不少党员加入十九路军与军内的地下党员接通了关系；（9）

并派潘汉年为代表，通过公开身份为十九路军政治干部地下党员梅龚彬与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但未成功。（10）此时上海地下党还通过“反帝大同盟”、“反日救国会”等外围组织和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发动了全市反日大罢工，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通讯队、运输队、募捐队等，有的担任后方勤务，有的直接配合作战，给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触犯了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政策，为蒋介石集团所不容。战前，蒋介石曾通过何应钦压制十九路军领导人“要忍辱负重”，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撤出防区，由宪兵第六团赴闸北接防。（11）抗战期间，蒋汪合作，一面严令前线部队“不得任意射击”，航空队“对日海军决不抛炸弹”，“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12）；一面乞请国联与日军勾通谈判。“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立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肃，始则试图肢解该军，遭多方反对；继则调其入闽，剿共”，以除京沪地带的心腹之患，并企图利用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蒋介石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和排斥异己的狠毒用心，使十九路军开始从拥蒋转向反蒋。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建立一定程度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

（二）

1932年6月8日，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乘海轮在福建泉州湾秀涂港登陆驻扎泉州地区；第六十师和七十八师也相继在厦门、龙海一带登陆，驻扎漳厦一线。7月6日，驻闽绥靖公署筹备人员抵榕。8月13日，十九路军补充旅由广东乘海轮开进福州。12月6日，蒋光鼐正式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出任

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3）

十九路军入闽后开始酝酿反蒋计划，拟把福建建成抗日反蒋基地。为防范蒋介石控制的蓝衣社（复兴社）渗透，秘密成立了改造社，并清洗蓝衣社在闽组织的成员，枪决首要分子，以绝后患；革除弊政，如废除苛捐杂税；采取各种措施以解决陈国辉等福建境内大小军阀的割据；通过收编张贞等地方杂牌部队，以扩充军事实力。同时，他们仍受蒋介石的驱使继续“剿共”，派兵进攻苏区和闽南游击区；在军内外捕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福州还发生公安局长邱兆琛枪杀率领群众开展肃劣运动的共产党员郑维新的事件。（14）

面对入闽后的十九路军，中共中央坚持共产国际在淞沪抗战中关于“争取士兵群众”反对“高级军官”的指示，采取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15）6月21日，党中央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提出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的主张，要求福建党组织训练干部以“领导与组织士兵日常斗争与哗变”。福建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站在与十九路军敌对的立场，开展一系列斗争活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六月二十五日的《“八一”工作决议与七月份工作计划》中提出：“加强发动士兵的斗争和组织革命的兵变”、“十九路军的六十师和五十六师、省二旅，要各发展一个支部和两个群众组织”、“要举行一个士兵运动周”。又于十月十五日的《市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议案》中强调：“兵委要立即建立健全起来”、“特别需责成莆田注意十九路军”、“要更有计划地大规模的积极去组织进攻红军的部队的兵变”。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也于7月23日作出了《对兵运问题的决议》。潜伏在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经福州地下党的介绍，与厦门中心市委接通了关系，在闽南、闽西一带大力开展“抗日军队不打红军”、“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工作。（16）

1932年底，针对十九路军反共、反人民的行径，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外，在政治上亦予以揭露。党中央发表《为十九路军反动长官屠杀和活埋英勇抗日士兵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闽粤赣党、团省委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书》，福州中心市委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十九路军来闽残杀“自己的同胞兄弟”的罪行，号召士兵“拖枪当红军”。福州、厦门两地中心市委还领导反帝同盟、互济会、肃劣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检查日货队等群众组织，以罢工、罢市、集会等形式，举行“八·一”、“九·一八”、“十月革命”、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和“广暴”等纪念活动，以及抗议“郑维新事件”、支援人力车工友和年关斗争等。（17）

1933年初，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告急。为反对日寇入侵华北，戳穿蒋介石制造“红军扰乱后方”的反共宣传。一月1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和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接着，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宣言》、《通电》、《公开信》等文告中，反复重申“共同抗日三条件”，2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发出《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给各地的指示》，传达了“共同抗日三条件”，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散发和宣传，“要把用这一口号去发动广大士兵的革命兵变，特别是对进攻闽西北的十九路军和五十六师等中心部队进行宣传”。福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对蒋介石不顾华北危亡坚持“攘

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卖国行动，开展各种抗议活动。福州中心市委发出了“组织援助热河后援会，成立福州民众义勇军，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恢复肃劣会彻底检查日货”的倡议。3月18日，地下党领导的“福州民众剧社”在集会公演和化装游行之后，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日商“美德洋行”，烧毁坞尾鱼行的日货。（18）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共同抗日三条件”看成“只是对群众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19）但客观事实表明，“共同抗日宣言”在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十九路军领导人“获悉之后，寄以新的希望”，感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20）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要求的影响下，不仅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中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并多次向南京政府请求出兵援助热河、华北。3月25日，他们自行组织了两个纵队的“援热先遣军”，取道广东、湖南北上抗日。（21）

5月下旬，蒋介石与日寇密商，图谋出卖华北、平津。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予以揭露。同日蒋光鼐、蔡廷锴亦通电指责南京当局“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死耳”，“屈辱的妥协，偷安旦夕势必至于亡国”。（22）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文告严辞抗议，福建各地群众和十九路军亦纷纷集会，通电指出：“言和者乃自绝于国民，国民亦必群起而诛之”，痛斥南京当局“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23）十九路军的崇论宏议不仅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北上的“援热先遣军”也于途中被严令返闽。这一切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公开发动一场抗日反蒋运动。（24）

6月间，从欧州考察回国的陈铭枢入闽，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在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内秘密开会，“决定了发动反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西南——广东、广西、福建大联合反蒋；中策是如广东不同意就联合广西共同解决陈济棠，夺取广东为根据地来反蒋；下策是如果上、中两策都行不通，最后则联合红军反蒋”。（25）随后，他们积极与粤桂联系，均告失败，摆在面前的只有联共一策。这时虽然他们内部意见尚未一致，但在领导层中联共意图已渐趋明朗。（26）

1933年6月13日，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团在《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中提出：红一方面军分兵作战，以一部组成“东方军”，先以宁化、清流为总方向，再以将乐、邵武为总方向，转入江西后与另一部组成的“中央军”会师抚州，挺进南昌，最终夺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7月1日，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正式组成，2日由江西东征福建。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的直接指挥下，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瞎指挥，连战皆捷，不仅狠狠打击了卢兴邦、刘和鼎等国民党杂牌部队，而且在连城的朋口、延平的芹山两个战役中，消灭了十九路军主力部队达四个团。（27）十九路军“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而蒋介石对此“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28）使十九路军面临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不容，“剿共”将为红军消灭的严峻局面，蔡廷锴等人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29）此间陈铭枢曾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协商，先后派朱蕴山、梅龚彬、彭泽湘等在刘伯垂、刘叔模的配合下，通过上海地下党与中共中央联络，（30）但是上海中央局采取排斥其他抗日力量的态度，致使这些联络毫无结果。（31）到了东方军威迫福州时，十九路军领导人遂急派陈公培找红军联络。（32）